

东京慧文社版《补注〈西藏通览〉》 文献价值初探*

彭蕊淇

提 要:《西藏通览》是日本人山县初男编著的一部全面介绍西藏地区自然环境与人文风俗的方志专书。该书1907年一经问世,便引发巨大反响,随后我国即有1909年四川西藏研究会编译的“石印版”与1913年民国北洋政府陆军部编译的“铅印版”问世。日本东京慧文社2010年出版的《补注〈西藏通览〉》是目前可知《西藏通览》的最新版本。通过对此版补注本的梳理与探究,不仅为下一步进行专书文献整理指明方向,同时将进一步加深对山县初男编著《西藏通览》的理解与认识,为我国西藏研究的发展作出贡献。

关键词: 山县初男 《西藏通览》 文献价值

《西藏通览》由日本陆军步兵大尉山县初男编著,是一部全面介绍西藏地区自然环境与人文风俗的方志专书。此书成书的根本目的是服务于日本染指我国西藏地区的野心。虽然山县本人在自序中提到此书是由于“本邦(即日本,笔者注)关于西藏之著书极少,可为研究之资料者亦颇缺乏”^①,博采众书编撰而成,但步兵少佐黑泽主一郎为其作序时,则赤裸裸地提出:“假令扶植其文运,开拓其富源,岂独东洋经济发展上之一利藪也乎?”^②由此日本帝国主义基于各种目的企图侵略我国西藏地区的野心昭然若揭。全书分上下两编,合计21章,不仅针对西藏历史、地理、交通、民俗、物产、贸易、政府、宗教、语言文字等方面进行了详细介绍,同时还就清末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对各列强深入我国藏地探险活动及英俄两强围绕我国西藏问题的争夺做了详尽系统的介绍。

山县初男(1873—1971),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早年在军队服役,曾参加日俄战争。此后40余年一直从事与中国相关的工作,是日本陆军有名的中国通。1923年,山县初男升任日本陆军大佐,担任中华民国云南省政府军事顾问。自军队退役后,也一直在中国从事所谓“和平工作”,曾担任八幡制铁所大冶办事处处长,著有《秘境云南》《卧牛庵吟草》《最新支那通志》等。

《西藏通览》日文原版成书于1907年,此时虽为日俄战后,但书中载录的史料正是关于“俄谋南侵,英筹北顾”^③之时作为两强争夺焦点的西藏地区。而日本亦想借“英日同盟”之名伺机染指我国西藏地区,但苦于资料匮乏^④,于是山县初男在公务之余博采众书编著而成的《西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清末西藏方志整理研究”(项目编号:17CMZ013)阶段性成果。对于慧文社版《补注〈西藏通览〉》的研究在国内尚属空白,且并无中文译本,本文中有关《补注〈西藏通览〉》的中文翻译均为笔者译。文中注释均先抄录日文原文,再在括号内注明中文译文,译文为笔者译。

① [日]山县初男编著,四川西藏研究会编译:《西藏通览》,宣统元年(1909)石印本,第1页。

② [日]山县初男编著,四川西藏研究会编译:《西藏通览》,第3页。

③ 单毓年编:《西藏小识》,“序言”,光绪三十四年(1908)抄本,第1页。

④ 参见[日]山县初男编著,四川西藏研究会编译:《西藏通览》,“自序”,第2页。

藏通览》便成为日本军界窥知西藏的重要参考。此书编纂的初衷是为日本势力渗透西藏提供参考，因此除传统方志中历史、地理等固有项目外，还新增时事、国际局势等相关内容。身为中国通的山县初男在编纂过程中不仅翻检查阅《康輶纪行》《西藏志》《卫藏通志》等大量中国传统西藏方志文献，还在摘引文献材料时加以甄别和考证，同时还参看了欧美及日本以各种理由深入西藏地区人员的旅行记录。值得一提的是，首位踏上西藏土地的日本僧人河口慧海的著述《西藏旅行记》中，多处关涉藏地民俗的真切记载亦为山县初男摘引。这部原本基于服务日本染指西藏野心而编撰的《西藏通览》，博采众家史料，内容翔实，体例完备，堪称近代以来对我国西藏地区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是日本早期西藏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

一 《西藏通览》版本源流梳理

日本陆军步兵大尉山县初男编著的《西藏通览》，其最早版本为1907年日本丸善株式会社出版的《西藏通览》。随后不久，当时民国四川西藏研究会就将此书重新编译，于1909年交付成都文伦书局发行。这部由四川西藏研究会编译的《西藏通览》即后来学人简称的“石印本”。又因该版本编纂完结之时，《译印〈西藏通览〉凡例》文末署有“光绪三十四年戊申十有二月，井研吴季昌权奇甫识”的落款，翻检《清史稿·德宗本纪》载光绪皇帝崩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冬十月”的“癸酉”，又《清史稿·宣统皇帝本纪》载：（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壬子朔”方“颁宣统元年时宪书”。故后人所谓的“光绪三十四年本”“宣统元年本”实皆为此本。此外，当时民国政府陆军部亦派专人对此书进行编译，于民国2年（1913）发行，即后来学人简称的“铅印本”。日本早期西藏研究著述如此迅速被引入国内并翻译出版，此书价值可见一斑。

日本东京慧文社2010年发行的《补注〈西藏通览〉》^①（以下简称“补注本”）是秉承1907年丸善株式会社版《西藏通览》，在最大限度保留原书样貌基础上，做了一定增益，一经面世就得到了国内外西藏研究学者的广泛关注。此书是慧文社所出“近代西藏史丛书”系列中的第8册，除原书《附录》中一部分图录由于年代久远不得以割爱外，另增加注解150条，且注解均以眉注形式出现。此外，为便于翻检阅读，在保留底本汉字页码的同时还补充了阿拉伯数字页码。总体来说，这本发行于2010年的补注本是目前可知《西藏通览》的最新版本。但或许是由于语言不通等原因，目前国内西藏研究学者尚无人对此书进行相关整理研究。故本文拟对此书新增的150条眉注的特点、价值及不足进行初步分析，期望为此书的深入研究略作铺垫。

二 《补注〈西藏通览〉》注解的类别与特点

此次补注本中新添加注释150条，除首页的出版说明外均为眉注。149条眉注中，除“八思巴文字——p1333”^②、“生蕃——前页”^③这两条指示说明类的眉注外，其余147条可依照其具体用途分为如下4类：

第一类：补充字词、订正错讹。此类眉注共计9条，对原版本中由于年代久远或影印不全等

^① 参见《补注〈西藏通览〉》，“出版说明”，东京慧文社，2010年，第1页。

^② 参见《补注〈西藏通览〉》，“出版说明”，东京慧文社，2010年。

^③ 《补注〈西藏通览〉》，第272页。原注：生蕃…前頁（生蕃——前页）。

原因造成的缺字、无法辨认的字词进行补充，如“补入漏字‘除’”^①等；对因原作者或原出版方疏忽所造成的错别字进行了修正，如将原本中“土司”的笔误修订为“土司”^②等。这些修订可使读者避免因缺字产生疑问，或因别字产生困惑。

第二类：规范专有名词和纪年法。《西藏通览》一书成书年代较早，且山县初男在编撰时参考了大量地方志和历史文献，难免出现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前后文载录不统一，或纪年方法不统一等问题。慧文社在补注此书时，为方便读者阅读，减少不必要的困扰，对这类用语一一进行补注。

此类眉批共计21处，除少数如“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③这样将时间统一为公元纪年外，更多的则是规范对专有名词的记录。山县初男在编纂《西藏通览》时参考了大量中外学者所著方志、游记类文献，由于文字之间的差异、文献性质的差异，造成对专有名词的使用和记录也各有不同。补注本面向的是日本读者，为方便阅读，此版将文中出现的人名、地名、称谓等专有名词均统一规范为日语标准表达式。如“达赖喇嘛”标注为“ダライ・ラマ”，“班禅喇嘛”标注为“パンチェン・ラマ”。^④另外对于前后文出现同一事物的不同表述也做了统一规范。如大昭寺，在全书中时而被称作“ジョカン寺”（日文标准表达式），时而被称作“チホーカハン”^⑤（藏文的日语发音），时而直接以汉字书作“大昭”^⑥，这些情况在眉注中都一一得到注明，统一为日本读者熟知的“ジョカン寺”和“大昭寺”这两种表达方式。

第三类：解释专有名词。此类眉注在补注本中所占比例最大，共102条，多为原文中涉及的人物、国名、地名、民族部落、宗教教派、生活习俗等相关专有名词的解释。这部分眉注都较长，因为编者在对这类专有名词进行解释时，除一般必要常识外，还针对各类名词所对应事物的特点进行较为详尽的解释。

此次补注本对于原书中涉及的人名，对其生卒行年、大事纪要都尽可能地进行了资料的搜集和考证。如原书中言及成书过程中参考了河口慧海的《西藏旅行记》，补注本即在眉注中注明：“河口慧海：佛教学者，僧侣。出生于大阪府堺市。在哲学馆，黄檗山万福寺学习后，独身一人奔赴西藏探险。1901年成为首位踏上拉萨土地的日本人，回国后成为大正大学教授（1866—1945）。”^⑦类似这样对人物进行详细说明的眉注，在书中随处可见。

① 《补注〈西藏通览〉》，第50页。原注：欠字「除」が入る（补入漏字“除”）。

② 《补注〈西藏通览〉》，第117页。原注：「土司」の誤記か（应该是“土司”的笔误）。

③ 《补注〈西藏通览〉》，第34页。原注：康熙三十八年…西曆一六九九年（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

④ 《补注〈西藏通览〉》，第56页。原注：達賴喇嘛/班禪喇嘛→ダライ・ラマ（p61）/パンチェン・ラマ（p120）（达赖喇嘛/班禅喇嘛→其日文表达方式分别为“ダライ・ラマ〈详见p61〉”“パンチェン・ラマ”〈详见p120〉）。

⑤ 参见原注：チホーカハン…ジョカン寺（前出p76），第79页。（チホーカハン（大昭寺藏文的日语音。笔者注）——大昭寺（前见p76））。

⑥ 《补注〈西藏通览〉》，第182页。原注：大昭…大昭寺（ジョカン寺）のこと（p76）（大昭——大昭寺〈日文表达方式为ジョカン寺〉）。

⑦ 《补注〈西藏通览〉》，第15页。原注：河口慧海…佛教学者、僧侣。大阪府堺市生。哲学館、黄檗山万福寺に学ぶ。单身チベット探検を敢行、一九〇一年、日本人で初めてラサに到達。帰国後、大正大学教授（1866—1945）。（河口慧海——佛教学者，僧侣。出生于大阪府堺市。在哲学馆，黄檗山万福寺学习后，独自一人赴西藏探险。1901年成为首位踏上拉萨土地的日本人，回国后成为大正大学教授〈1866—1945〉）。

在对国名、地名的解说中，补注本除侧重对实际地理环境的介绍外，更将重心放在了记录方式、领土归属及其宗教或政治意义的梳理上。如原书提到在库伦地区有近 10000 名僧人，补注本即注“库伦：即现在乌兰巴托市的中文旧称。俄语发音ウルガ，蒙古语发音フレ一”^①，不仅明确了库伦地区现在的地理位置是蒙古国乌兰巴托市，又将其俄语、蒙古语发音一并附上，便于读者索引其他文献。另如原书在贸易一章中提到西藏与锡金有贸易往来，补注本在解释了锡金的地理位置“位于不丹、尼泊尔和西藏之间的喜马拉雅山脉南麓地带”后，还还原了其由一个藩属王国发展到现在“锡金邦”的过程：“藏系藩属王国。1642 年由宁玛派支持者蓬楚格·纳姆伽尔建立。1890 年成为英属印度的保护国，1975 年并入印度称‘锡金邦’。”^②

除此之外，补注本对于与宗教或政治关联比较紧密的地名也在解释时有所侧重。例如原书在政体一章中提到布达拉宫，补注本解释：“布达拉宫是位于拉萨的达赖喇嘛的宫殿，由达赖喇嘛五世在吐蕃王国赞普松赞干布所建宫殿的遗址上以重修扩建的形式建成。布达拉的名字源自传说中观音菩萨所居之山普陀洛伽山的梵语‘普陀洛迦’。”^③ 不仅说明了布达拉宫的位置、原址，也指出其名称的来源与宗教相关。

第四类：背景知识补充。此类眉注是为了方便读者阅读而增添的，共 15 条。为常识性知识的补充说明，多集中在书的前半册。比如，在全书正式开始时，补注本为了让读者对西藏有一个大致了解，特从地理环境方面对西藏做了大致描述：“西藏三面环山，南接喜马拉雅山脉，北接昆仑、祁连山脉，东接邛崃山脉。”^④ 这样的说明对于西藏研究专家来说或许多此一舉，但对于初次接触西藏的读者或西藏研究的入门者来说，却可以为他们进一步了解西藏奠定基础。

除了这样“入门级别”的常识外，为便于读者理解远在千里之外的西藏自然环境，补注本还常以类比的方式解释说明。如原书在气候一章中记述“西藏空气干燥”^⑤，为方便读者理解，

① 《补注〈西藏通览〉》，第 134 页。原注：庫倫…現在のウランバートル市の中国語での旧称。ロシア語ウルガ、モンゴル語フレ一（库伦——现乌兰巴托市的中文旧称，俄语发音为ウルガ，蒙古语发音为フレ一）。

② 《补注〈西藏通览〉》，第 160 页。原注：シッキム…ブータン・ネパール・チベットの間のヒマラヤ南麓にあったチベット系の藩王国。一六四二年、ニンマ派の有力者プンツォク・ナムギャルが興した。一八九〇年英領インドの保護国となり、一九七五年インドのシッキム州として編入された（锡金——位于不丹、尼泊尔和西藏之间的喜马拉雅山脉南麓地带。藏系藩属王国。1642 年由宁玛派支持者蓬楚格·纳姆伽尔建立。1890 年成为英属印度的保护国，1975 年并入印度称锡金邦）。

③ 《补注〈西藏通览〉》，第 113 页。原注：ポタラ宮…ラサにあるダライ・ラマの宮殿。ダライ・ラマ五世（p97）の代に、吐蕃王ソンツェン・ガンボの築いた宮殿の遺跡を増補、拡充するかたちで建設された。ポタラの名は観音菩薩の住むとされる補陀落のサンスクリット語名「ポタラカ」に由来する（布达拉宫——布达拉宫是位于拉萨的达赖喇嘛的宫殿，由达赖喇嘛五世在吐蕃王国赞普松赞干布所建宫殿的遗址上以重修扩建的形式建成。布达拉的名字源自传说中观音菩萨所居之山普陀洛伽山的梵语‘普陀洛迦’）。

④ 《补注〈西藏通览〉》，第 42 页。原注：チベットは、南はヒマラヤ山脈、北は崑崙山脈、祁連山脈、東は邛崃山脈などに囲まれている（西藏三面环山，南接喜马拉雅山脉，北接昆仑、祁连山脉，东接邛崃山脉）。

⑤ 《补注〈西藏通览〉》，第 51 页。原文：西藏高原は空気乾燥に過るを以て数月間終に一片の雪を見さるとあり……（西藏高原空气干燥，时有数月间未见一片雪花的情况……）。

补注本特以拉萨和东京的平均降水量作对比，以解释西藏空气干燥的原因在于降雨稀少。“拉萨的年降雨量大约在200—500毫米，6月到9月为雨季。类比1971—2000年东京超过1400毫米的年降雨量来说，拉萨的年降雨量可谓极少。”^①

综上所述，补注本所增添的150条眉批，种类丰富，各有侧重。其中专有名词解释和常识性说明所占比重最大，这可能是由于此版旨在普及常识，将目标群体定位在一般读者上的原因。

三 《补注〈西藏通览〉》注解的缺憾与不足

由于慧文社此次出版的《补注〈西藏通览〉》旨在文献的保存与整理，同时方便读者阅读，并非专业文献校注，因此也存在些许不足之处。

一是考证不足，文献价值不高。补注本虽然做了大量的补注，但多集中于专有名词解释和常识性说明，最终目的是方便一般读者阅读。虽然也对缺字、误字做了相应的修补，但在新添150条眉注中，修补订正类仅有21条，说明校勘并不是这一版本的重点。补注本仅以1907年丸善株式会社出版的《西藏通览》为原型，所增添缺字、误字的修补均为编者结合上下文进行的合理推测，并未对现行《西藏通览》的各版本进行对照考证。编者可能也是意识到这一不足，除去一部分通过上下文可以相对明确推测出来的缺字、误字外，其余均谨慎地使用推测语气。如编者推测原文中的“よけ”可能是“より”的误字时，在眉批中就使用了推测语气。^②

同时，此版补注的重心，即专有名词解释和常识性说明部分，也并非面面俱到。比如在《西藏通览》中第15章交通部分，一改一直以来出现的长度计量单位“里”，而使用“清里”进行计量，但补注本的眉批中既未表明两者关系，又未对“清里”进行解释。类似这样未进行补注的专有名词还有很多，这对于抱着答疑解惑态度阅读此版的读者来说，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二是未添标点，影响阅读。在以往的版本中，最为人诟病的莫过于“保存着其刻本原来的模样，未加标点”^③，补注本也存在这个问题。补注本虽然增添了阿拉伯数字页码，补注了缺字、漏字，矫正了误字，统一了前后文表达记录方式，但并没有添加标点，这给阅读和翻译造成了很大困难。《西藏通览》原书由于是地方志性文献，书中用语较为生涩难懂，加之没有标点无法断句，致使后人阅读、校勘、翻译时难度较大。补注本并未对这一现象进行修补，实为遗憾。

三是背景知识补充有待完善。补注本的一大特色是新添了很多专有名词解释和常识性说明。其中对人物的说明不仅仅停留在人名上，而是围绕其生卒行年、大事纪要进行详细说明。但这类辅助信息尚有待完善之处。比如人物解释时常附于其后的时间，多数为该人物的生卒年，如河口

① 《补注〈西藏通览〉》，第51页。原注：ラサの年間での降雨量は、およそ二〇〇～五〇〇ミリで、六月から九月が雨季。一九七一年—二〇〇〇年の東京の平均降水量が、一四〇〇ミリ余りであることを考えると、だいぶ少ない（拉萨的年降雨量大约在200—500毫米，6—9月为雨季。类比1971—2000年东京超过1400毫米的年降雨量来说，拉萨的年降雨量可谓极少）。

② 参见《补注〈西藏通览〉》，第58页。原注：「よけ」…「より」の誤記か（よけ——应该是“より”的笔误吧。）其中「か」为日语中表示推测语气的助词（笔者注）。

③ 王雷：《〈西藏通览〉整理与研究》，《雪莲》2015年第12期。

慧海 1866—1945，但也有少数生卒年不详的人物，眉注中或直接省略其生卒年，或以其在位时间代替，如在描述俄皇彼得一世时，就只考证了其在位时间。^①

补注本在涉及外国人名，尤其是欧美人名时，以日文发音直接表记，并未附上其原名。这一不利于非日语读者阅读，二不利于读者进行文献考证和资料查询，给读者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如书中反复提到的英国军官ヤングハズバンド，经笔者反复查证确认此人即为英国驻西藏特派员荣赫鹏，如果在眉注中附上该人英文名 Younghusband，就不会有这样的困扰了。

四是笔误之处。补注本还出现了几处笔误，如指示类眉注：“八思巴文字→p1333”，很明显是 p133 的笔误。另有原书在物产章中提到“西藏有犏牛、犛牛、黄牛、牦牛等数种牛”^②，为了解释这几种牛的不同，补注本特做眉注：“犛牛即牦牛。生长在青藏高原的一种牛，因可用做劳作，割皮毛，挤奶，食用而被西藏人民广泛饲养。牦牛和牛杂交生犏牛，藏语称为 mdzo。”^③ 但事实上犏牛是牦牛和黄牛的杂交。原书中既然已经出现了黄牛，并将黄牛看作牛的一种，补注本中就不应将两者混为一谈。此外，补注本在保留原本汉字页码的同时，新加入了阿拉伯数字页码，这虽然方便了读者翻检查阅，但也增加了页码混淆的风险。书中绝大多数眉注在指示页码时，使用阿拉伯数字页码，但也有几处不慎误用了原书的汉字页码。比如“達賴喇嘛/班禪喇嘛→ダライ・ラマ (p61) /パンチェン・ラマ (p120)”^④，这条眉注是为了提示达赖喇嘛、班禅喇嘛的日文表达方式并详细解释其在原书中的位置，但所标注的页码 p61 和 p120 却均为原版本中的汉字页码，很明显属于笔误。

四 《补注〈西藏通览〉》的价值与意义

笔者认为慧文社出版的《补注〈西藏通览〉》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历史文献意义。尽管《西藏通览》的编纂，有日本军国主义渗透、染指我国西藏的目的成分，但该书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近代以来西藏方志编纂的某些缺失与不足，具有不容忽视的史料文献价值。百年后的今天，对该书进行补注，有助于深入了解原书中所展现的翔实史料。同时，我们更应深思慎取其文献价值，铭记历史，以昭后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梳理并活用其中的历史文献，为我国建设西藏、巩固边防作出贡献。

二是促进文献传播。目前为众人所熟知的《西藏通览》版本，日本有 1907 年丸善株式会社版，国内有 1909 年四川西藏研究会编译的石印本和 1913 年民国北洋政府陆军部编译的铅印本。目前国内所见收录于各处的《西藏通览》均源于此两版本。换言之，堪称近代以来对我国西藏

① 参见《补注〈西藏通览〉》，第 327 页。原注：ロシア皇帝ピョートル一世（1682—1725 年在位）は、ロシアの南下政策、東方進出を進めた（俄皇彼得一世〈1682—1725 年在位〉，推行俄军南下及东进行动）。

② 《补注〈西藏通览〉》，第 170 页。原文：牛は犏牛、犛牛、黄牛、牦牛等の數種あり……（西藏有犏牛、犛牛、黄牛、牦牛等数种牛……）。

③ 《补注〈西藏通览〉》，第 170 页。原注：犛牛…ヤクのこと。チベット高原の高地に生息するウシの一種。荷役用、毛皮用、乳用、食肉用としてチベット民族に広く用いられる。犏牛はヤクとウシの雜種で、チベット語ではゾ（mdzo）（犛牛即牦牛。生长在青藏高原的一种牛，因可用做劳作，割皮毛，挤奶，食用而被西藏人民广泛饲养。牦牛和牛杂交生犏牛，藏语称为 mdzo）。

④ 参见原注：達賴喇嘛/班禪喇嘛→ダライ・ラマ (p61) /パンチェン・ラマ (p120)，第 56 页。（达赖喇嘛/班禅喇嘛→其日文表达方式分别为“ダライ・ラマ〈详见 p61〉”“パンチェン・ラマ”〈详见 p120〉）。

地区研究集大成之作的《西藏通览》，自1913年以后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日本，均无新版本出现。从文献传播角度来说，实为藏学基础文献传播方面的一大憾事。此次补注本的刊印填补了这一空白。

三是利于点校整理。《西藏通览》问世于1907年，因编纂年代久远，虽为西藏研究界所重视，但一般读者知之甚少。况且此次慧文社重新刊印亦距上次已有百年之久。国内目前流传版本以四川西藏研究会编译的石印本和民国北洋政府陆军部编译的铅印本为主，石印本流传更广。但石印本本身亦存在颇多问题，其刊行之时，刊印者亦直言：“为时甚促，又系数人合译，其间不无抵牾，词笔不一。”^①且古籍整理当重“考镜源流”，在对《西藏通览》进行研究整理时，无论立足石印本还是铅印本，都不能对堪称源头的丸善株式会社本视而不见。补注本的出现，究其本质上是对1907年丸善株式会社本的再版，这极大地方便了整理过程中对原始版本的考察，以及版本参校等专项工作，为《西藏通览》系统的点校整理工作奠定了基础。

四是纠正翻译错误。我国国内流通两种版本，详细翻检其中文句，无论是石印本还是铅印本都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错误，且其中许多是在初次翻译日文原本时产生的。如石印本在叙述某山海拔超过多少米时，皆生硬地将日语“……米突”直接抄写过来。也有在翻译过程中出现严重错误的，如第5章第10节礼仪中日语原文是：“拜は必ず手地に據り犬號を為し…”^②，原意为“凡拜，必双手据地作犬状高呼”，而石印本则翻译为“以手据地作大号声”，很明显是在翻译时将“犬”误看成“大”，导致译文与原本意义相去甚远。此次补注本的刊行，为纠正这些错误提供了较为可靠易得的版本，对辨正这些翻译中的问题，提供扎实可靠的文献源头。

五是便于翻检查阅。补注本虽为日文版本，但全书按照卷首目录排印了页码；在文中罗列人名、地名、官职名等专有名词时，都用顿号隔开；在同一章节中叙述不同内容时，能够做到独立成段，分段陈述。并且对待摘引文献时，能够首先从格式上用全段首行缩进的方式予以表明。这些改进，相较国内通行的石印本来说，都极大地方便了读者的翻检和查阅。

结 语

综上所述，补注本是目前可知《西藏通览》的最新版注本，其主要面向日本一般读者群体，旨在普及常识，推广文献。此次补注本由于是系列丛书出版，而非专书校勘，因此并未进行各版本间考证，存在上述几点不足之处。虽略有瑕疵，但为下一步进行专书的文献整理指明方向，同时，对补注本的研究与翻译将进一步加深对《西藏通览》的理解与认识，铭记历史，昭示未来，为我国西藏研究的发展作出贡献。

（作者单位：西藏民族大学外语学院）

本文责编：周 全

^① [日] 山县初男编著，《西藏通览》，“译印西藏通览凡例”，第11页。

^② [日] 山县初男编著，《西藏通览》，第34页。